

经济学家思想译丛

# 经济学家的人生

经济学史中的自传与他传

(美) 巴罗伊·温特劳布

(加) 艾佛林·F·佛哥特 编

李丹奎 译

ECONOMISTS' LIVES:  
BIOGRAPHY AND AUTOBIOGRAPHY  
I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S

E. Roy Weintraub Evelyn L. Forget



FE 经济学院出版社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Press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 经济学家的人生

## 经济学史中的自传与他传

(美) 巴罗伊·温特劳布

(加) 艾佛林·「佛哥特」 编

李井奎 译

ECONOMISTS' LIVES:  
BIOGRAPHY AND AUTOBIOGRAPHY  
I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S

E. Roy Weintraub Evelyn L. Forget



辽宁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06-2013-85

Economists' Lives, E.Roy Weintraub, Evelyn L. Forget, ed.

Copyright©2008 by Duke University Press

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rights©2016 by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简体中文翻译版由杜克大学出版社授权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独家出版发行。未经授权的本书出口将被视为违反版权法的行为。未经出版者预先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发行本书的任何部分。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经济学家的人生：经济学史中的自传与他传 / (美) E. 罗伊·温特劳布 (E. Roy Weintraub), (加) 艾佛林·L. 佛哥特 (Evelyn L. Forget) 编; 李井奎译. —大连: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17.3  
(经济学家思想译丛)

ISBN 978-7-5654-2576-9

I. 经… II. ①E… ②艾… ③李… III. 经济学家—思想评论—世界 IV. F90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88487 号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大连市黑石礁尖山街 217 号 邮政编码 116025

网 址: <http://www.dufep.cn>

读者信箱: [dufep@dufe.edu.cn](mailto:dufep@dufe.edu.cn)

大连图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幅面尺寸: 170mm×240mm 字数: 371 千字 印张: 22.75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李 季 吉 扬

责任校对: 贝 力

封面设计: 冀贵收

版式设计: 钟福建

定价: 59.00 元

教学支持 售后服务 联系电话: (0411) 84710309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411) 84710523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联系营销部: (0411) 84710711

# 目 录

|           |   |
|-----------|---|
| 导 言 ..... | 1 |
|-----------|---|

## 第一部分 缘 起

|                                    |    |
|------------------------------------|----|
| 重新发现思想传记以及它的局限 .....               | 9  |
| 自传不但无用而且与学术相背离吗？关于学术性自传的几点思考 ..... | 27 |

## 第二部分 形形色色的经济学家传记

|                               |    |
|-------------------------------|----|
| 生平提要：经济史学家短篇传记作品的写作及其用途 ..... | 49 |
| 经济学史上的一个问题：英雄人物与反面角色的创造 ..... | 74 |
| 作为一种经济学家传记写作体裁的群体传记 .....     | 95 |

## 第三部分 自传与身份

|                           |     |
|---------------------------|-----|
| 叙事身份的经济含义 .....           | 117 |
| 运用自传式陈述来研究美国经济学家的身份 ..... | 133 |
| 口述史在异端经济学史编纂中的作用 .....    | 151 |
| 口述史和芝加哥经济学的历史重建 .....     | 168 |

## 第四部分 传记的研究

|                                                   |     |
|---------------------------------------------------|-----|
| 弗朗索瓦·魁奈：凡尔赛宫的“乡村苏格拉底”吗？ .....                     | 189 |
| 学者与企业家生平之间的一些关系：L.阿尔伯特·哈恩的传记 .....                | 208 |
| 关于20世纪20年代的均衡和数学的“交会地带”或者奥斯卡·摩根斯坦<br>想象中的回忆 ..... | 226 |
|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与弗吉尼亚·伍尔夫：私人友谊与职业友谊 .....               | 256 |
| 团体的私密空间：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与艺术 .....                       | 277 |

## 第五部分 传记作家的写作

|                            |     |
|----------------------------|-----|
| 他传与自传：哈利·约翰森 .....         | 301 |
| 传记写作：F.A.哈耶克带给我的职业训练 ..... | 325 |

|                |     |
|----------------|-----|
| 马歇尔传记沉思录 ..... | 337 |
| 个人后记 .....     | 348 |
| 作者简介 .....     | 352 |
| 译后记 .....      | 356 |

## 导 言<sup>①</sup>

E. 罗伊·温特劳布 艾佛林·L. 佛哥特

在非学术性书店里，传记和自传几乎与浪漫小说或神秘小说一样随处可见。人们似乎乐于了解其他人的生活，这或许可以让他们把自己的生活投射到传记主人的人生当中，或者去想想如果非富即贵的人生该怎么度过。不过，在更为专业的领域里，比如科学史，传记就必须力争才能得到一席之地了。如果科学史的主人公所树立的形象已经在启蒙的事业中为科学争得了一席之地，那么，我们主要关心的事情就是去就科学知识的发展进行解释和文本化就可以了：一个个体科学家的生活只在其知识产品与之后持续的重要影响有其关联这个层面才有意义。如果科学知识的增长与具体的科学团体和机构密切相关，那么，个人就必然会逐渐隐没在这种社会史的大背景中去了。然而，在20世纪的最后25年里，的确出现了一股转向个人的风潮，了解知识产生的具体环境——在诸多学科中为学者们所广泛共享的立场——已经大大打消了人们对科学史中传记和生平写作的疑虑。个人在科学中表达他们对生活的态度，而他们的科学研究也是他们生活的表达。正如历史学家玛丽·特劳尔（Mary Terrall）（2006，313）所注意到的那样，“历史学家从历史的隐蔽之处变魔术一般地构建历史形象，他们的手法或与小说家不同，或者说使用的技术手段不同，但是本质却无差别。从各种资料证据中重新拣选、重新构建，撰写个人的生平，也就意味着在通过其参与者的生活体验撰写科学本身。将那些尘封已久的信件打开，去搜寻那些驱使我们去研究的‘易变而又感性的力量’，我们被引导着进入了读者们、旁观者们、制度、合作、争端以及所有构成科学生活的那些互动的世界。”

---

<sup>①</sup> 编者感谢杜克大学出版社、Cathy Davidson（杜克大学跨学科研究的副主任）、Susan Roth（杜克大学的社会科学系副主任）以及让-雅克·托马斯（加拿大和北美研究指导）为2006年HOPE会议所提供的慷慨的财务支持。

经济学史家对于生平写作一直摇摆不定，矛盾重重，如威廉·加菲（William Jaffe）所问——传记应否成为经济学史叙事的一员，或者真如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所坚持认为的——这类记述与思想史毫无关系。第一人称的叙述又将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在构建我们的历史上，我们会利用自传材料，但是作为一门学科，我们一直没有就这些材料是如何以及为何产生以及保存的，进行过严肃的考虑，我们也没有想过这些材料应该如何被当代历史学家们阅读和解释。在我们所做的思考之中，我们利用访谈和口述史这类关于传主的材料，因为我们试图去理解这些人在经济学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是什么。但是，对于这类对话和证言，我们该作何解释呢？

我们不能完全模仿科学史家所给出的答案。经济学史和科学史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差异。与科学史家不同，经济学史家并不是站在他们要研究的学科的“大门外”，他们往往对经济学家的生活相对熟悉，因此，对于这些人的生活，他们对其中存在的各种偶然性多多少少会心有戚戚焉。在经济学史中，自传与传记差别不大，而就其大部分而言，经济学史家在他们的思想建构过程中已经谨慎地使用到了这些自我陈述。尽管很少有经济学家的传记可以和诸如理查德·S.维斯特佛（Richard S. Westfall）所做的牛顿传比肩，但是，经济学家们自己也和经济史学家一样在部分地将构筑传记作为他工作的一部分。

通过短篇传记、长篇传记、对谈片段和短篇传记文集这类可以取得的资料，有关生活叙事的研究文献不断增长，鉴于此，我们认为将这些材料更加充分地展示在经济学史家的面前，引起他们的注意，已经是时候了。我们最初征集稿件时即要求题材可以多种多样，举凡对自传材料的处理，对英雄和反面人物的写作，有关科学传记和文学传记之间的关系，与传主生平在近来历史中相关的各类记录，还有其他诸如此类的题材，都可以入选。我们收到了大量来稿，对此感到非常满意，最终我们将2006年HOPE会议的文章结集出版，这些文章涉及经济史学家需要关注到的方方面面。除了经济学史家之外，还有一些入选者来自文学、历史和社会学领域。会议的主题推陈出新，这就意味着参会者不必总是固守在一成不变的个人宣讲方式之下。因此，这次HOPE会议还包括与会者细致聆听相关人员的研究展示，对一些新的思想进行讨论，对于在会议上完成的工作进行集体性的重新思考。另外，即便大家不一定都达成了共识，这次会议至少深化了与会者之间对经济学史中的传记和自传写作的理解。

本书以思想传记的前景、局限之讨论开篇。在第一部分中，马拉奇·哈克恩（Malachi Hacohen）这样对我们提出挑战，他问道，传记作者是否了解我们本该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所汲取的教训，彼时传记写作失去了活力，处

于被流放的境地，不再相信思想史学者能够对这一领域做出什么贡献。传记是不是已经变成了一个不值得为其付出的自感卑贱的事情呢？它所宣扬的那些优势——对于个体生活的情境逻辑所具有的精确性能够就创造的可能性与局限性进行阐释，而且可以揭示彰显个体决策的集体结构——在认识到了其弱点之后还值得继续关注吗？哈克恩认为，当年的那些思想传记在流行话语的演进过程中所能给出的阐释并不多，它们对个体思想者的思想对他们追求其生活中各类事情的社会和思想世界的印象也解释得不够好。

杰里米·波普金（Jeremy Popkin）也指出了自我和传记写作中更加宽阔的世界之间存在的关系。他这样问道，当一位学者，一位在某一学科领域为追求知识和理解这个世界而穷尽一生之人，开始撰写自传之时，到底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这位作者自己的专业学术训练与他的传记写作之间会存在什么样的关系？尤其是，这种由经济学家构造起来的生平故事与那些历史学家或文学批评家构造起来的故事又有什么不同呢？波普金认为，所有优秀的学术著作都从学者那独一无二的激情之中获得了能量。不过，学术训练也可以为自我的认识提供手段。学术传记以学科范式所塑造的方式来对自己的人生进行架构，这些学科范式是作者在其学术生涯中使用的，以至于某种程度上要把真实的“自我”与取得职业成功的那个个人彼此分开几乎是不可能的。

本书第二部分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经济学家是怎样在其思想研究中运用传记这种方式的。罗杰·巴克豪斯（Roger Backhouse）对经济学中更加丰富多彩的生平写作中的一种进行了验看，这种类型就是短篇传记文集，它们在尽可能地帮助我们认识知识乃是经济学家们彼此交流的产物。可能通过检视除了少数几位值得为其树立长篇传记的学者之外的其他学者们的生平和贡献，我们有希望去理解有关流行话语演进的轨迹。罗伯特·迪曼德（Robert Dimand）对妖魔化和英雄化过去时代的经济学家的意义进行了思考，他认为，那些未经深思的宣扬和中伤既有好处，也有代价，二者各半。对传奇性格和脱离现实生活的性格特征的塑造，或许至少可以吸引到某些人对这些思想遗产的关注，如果没有这类戏剧性的表达，很可能会为只重视当下的科学氛围所遗忘。本质上来说，这类故事虽然本身存在着缺陷，但却可以为新的研究和思考提供机会。威廉姆·科尔曼（William Coleman）在他的论文中对类似的课题进行了考察，这篇文章反映了他对澳大利亚公共生活中经济学家的群体传记的研究成果。和巴克豪斯一样，科尔曼也问道，我们通过撰写“如同镜子一样的别人的生平”可以学到什么，而且他也和巴克豪斯一样总结道，群体传记可能更加能够让我们去理解经济学的演化过程，经济学乃是一门社会性参与的学科，在这个过程

中，群体传记较之于伟大思想家的个体传记要更有力。

第三部分关注的是叙事身份和经济学家使用生平写作来创造自己的和群体的身份这类主题。保罗·约翰·伊金将我们带回到了19世纪，他问道，变化着的经济条件是如何反映到普通人的经济生活中去的，这个问题曾由亨利·梅修（Henry Mayhew）“卖豆瓣菜的八岁小女孩”的故事予以精彩地阐发过。在维多利亚时代的伦敦，一个童工是如何来理解她的经济贡献的，以及她的看法与20世纪的自传作家们所给出的参考存在着系统性的差别吗？麦克·里亚（Mike Reay）也涉足了同样的主题，他问道，20世纪的经济学家是如何理解作为经济学家的他们自己的，以及这种理解是如何反映在他所做的那些访谈中的，他的访谈对象包括工作在不同的学术和非学术机构中的美国经济学家。经济学家的子群的身份也非常有意义。当我们说“芝加哥”经济学家或“异端”经济学家时，我们在指什么？罗斯·艾米特（Ross Emmett）对前者进行了审视，提亚哥·马塔（Tiago Mata）和弗莱德·李（Fred Lee）则关注了第二个，他们使用的都是访谈和口述史这样的办法。

第四部分转向一系列对具体的经济学家所做的传记研究。克里斯汀·泰尔（Christine There）和劳伊克·查尔斯（Loic Charles）完成了一项对弗朗西斯·魁奈的过往传记的知识考古，通过发现祭文、学术期刊出版的短篇颂词以及长篇传记，他们做了一项非常出色的研究。他们表明，在某些传记中不可避免存在的神话是如何得到加强，并保留在更多的学者传记中的，最终这带给我们的是一幅传主的同时代人根本无从辨别的图画，而这些同时代人才是更加理解当时的背景，以及对不同时代的文体更加熟悉的修辞方式的。他们通过魁奈传记这样一个窗口，为我们揭示了18世纪波旁王朝的历史画面，泰尔和查尔斯对当时学者们的雄心壮志进行了丰富和细致的描绘。让-奥特玛尔·荷西（Jan-Otmar Hesse）回到了一个至少在很多这类著作中都被隐在背后的主题。到底是什么把一名经济学家与其他的学者区分开来的呢，要知道，在有些情况下，以及更可能在早期阶段，经济学家并不是纯粹的学者，他们都是在大学之外讨生活的人。他通过对L.阿尔伯特·哈恩（L. Albert Hahn）的研究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个人的开拓性行为是否不仅有助于塑造他们为其自身所塑造的身份，而且最终也塑造了其经济著作的撰写呢。罗伯特·伦纳德（Robert Leonard）关注奥斯卡·摩根斯坦（Oscar Morgenstern）的性格特征，以反思20世纪20年代对均衡和数学的影响。这是否模糊了传记中主客观之间的界限呢，有些与会者发出了这样的疑问，或者说，它是不是只就那些存在于传记作者和传

主之间的不稳定的以及可渗透的边界予以诚实地披露进行反思呢？<sup>①</sup>克劳福德·D.古德温（Craufurd D. Goodwin）和帕特里西亚·劳伦斯（Patricia Lawrence）两人对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生平和著作中社会、艺术和友谊所扮演的角色进行了探究。古德温提到，经济学史家很少去对他们研究对象的个人生活进行更为宽广的研究，这一点远不如政治、文化和企业领袖的传记作者。他的文章对凯恩斯著作中某些特别令人感到困惑的地方进行了研究，其中包括他对人们该如何生活在一个更高等的市场经济中的思考等。查看凯恩斯与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关系便可发现，此人对20世纪的小说之影响，堪与凯恩斯对经济学的影响相媲美，古德温问道，伍尔夫是否对凯恩斯世界观的发展造成了影响，这本身也是特别值得经济学史家关注的。劳伦斯从一个更加宽广的视角提出了一类类似的问题，主要是研究布鲁姆斯伯里团体之间的关系是如何影响凯恩斯对艺术的兴趣的。

第五部分包括了三篇对著名的经济学传记的反思，其所立足的问题是经济学史中更为宏大的课题。唐·莫格里奇（Don Moggridge）在他关于哈利·约翰森（Harry Johnson）的传记中对如何使用自传材料进行了思考。布鲁斯·考德威尔（Bruce Caldwell）这位弗里德里希·A.哈耶克的传记作者，从他研究哈耶克的沟沟坎坎中给我们一系列的注记，这些沟沟坎坎都是他在写作20世纪经济学界最伟大学者之一的生平时所遇到的问题。彼得·格罗尼韦根（Peter Groenewegen）不仅回顾了他的马歇尔传记的写作，而且也对读者的反响进行了回应，他提醒我们，传记不仅是传主与传记作者之间的简单对话，而且最终躲不开的还有与读者之间的对话。

本书最终以罗伊·温特劳布的个人思考来做结语，在这篇结语中，他提出了很多关涉到生平写作的主题，并提醒我们为什么这类题材在读者中间能够引起这么大的反响。毕竟，创造一种生活，本身就是我们所有都涉乎其中的工程。

---

① 与其他会议论文不同，伦纳德的论文之前已经发表过。编辑要求伦纳德对这篇文章进行会议宣读，由于时间在杂志要求的发表期限之后，所以先行发表了，这位编辑对伦纳德所关心的事情以及会场出现的反应印象极为深刻。

### 参考文献

Terrall, M. 2006. Biography as Cultural History of Science. *Isis* 97:306-13.

## 第一部分

### 缘 起



## 重新发现思想传记以及它的局限

马拉奇·哈克恩

传记开始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那些经历过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历史、科学研究和文学评论变革的人们，或许会对此感到惊诧，我的感受也是这样。20世纪80年代，当时的我还在攻读研究生学位，传记作为一种专业历史写作类型，几乎已经湮没无闻。社会和文化史对文学、人类学和文化研究的方法论多有借鉴，也对传记写作表现出了明显的敌意，尤其当传记的主人公是一些精英思想家的时候，更是如此。历史和科学哲学也在经历着文化上的转向，而且无论话语结构分析的方法论多么地丰富多样，传记写作都不是这类方法论中的一种。即便是在思想史方面，主流方法也遮蔽了文本与作者，使之湮没在话语表述之中，使语言而非生平成为了所关注的对象。的确，传记总是保留着一些备受偏爱的体裁，诸如大众历史、军事史和政治史这些方面的题材，它们所面向的读者是更为广泛的社会群体。可是，在过去十年中，于历史的诸多领域，传记写作均表现出强势回归的态势。2006年的HOPE会议——“传记写作与经济学史”——的举行可谓恰逢其时。通过我们在话语历史曲折前行中的所学所悟，我们现在有必要对传记写作的潜质和它所面临的困境进行反思。

作为一名因出版了青年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sup>①</sup>思想传记而声名鹊起的历史学家，曾常年徘徊于历史学家共和国城门前，而今一举跃过龙门，成为一名成熟的历史学家，我或许会为之感到欣慰。但我的欣慰之情打了不少折扣，因为我并不确定，我们是否已经认识到被放逐的现实困境带给我们的深刻

---

① 卡尔·波普尔，1902年7月28日出生于奥地利维也纳（当时属于奥匈帝国）的一个犹太裔中产阶级家庭，毕业于维也纳大学。波普尔是批判理性主义的创始人。他认为经验观察必须以一定理论为指导，但理论本身又是可证伪的，因此应对之采取批判的态度。在他看来，可证伪性是科学的不可缺少的特征，科学的增长是通过猜想和反驳发展的，理论不能被证实，只能被证伪，因而其理论又被称为证伪主义。20世纪50年代后，他的研究重点转向本体论，提出了“三个世界”的理论。著有《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科学发现的逻辑》《猜想与反驳》等。——译者注

教训。可以肯定的是，历史学家写作传记的实验，在一些情况下，确实呈现出了一种语言学转向方法论上的姿态。新的传记并不总是能够凸显出我们对传记所存在的困难具有清醒的意识，反而会普遍地犯同样的错误，为此，我们这代人不得不忍受独守荒野的落寞。类似于这样的情况实在是不胜枚举。随便给我们的读者列举一个与此相关的例子吧，对于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sup>①</sup>“暧昧不明的反犹太主义”（这是因为他对犹太朋友的高度尊重与他偶尔使用的反犹太主义的陈词滥调形成鲜明对比的缘故），我一直饶有兴趣，并一直关注学术刊物和电子邮件群中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其结果，对那些在构造丰富的思想情境中显露出来的局限性，我只是大感失望而别无他想，而这些思想情境原本是可以营造出一种关于种族歧视的理性交流氛围的（Reader 2000, 2002; Hamowy 2002; Weintraub 2003）。如果传记想要对经济思想史有所建树，它就不能再是20世纪80年代前普遍实践过的那种传记形态。

如若在此再对最近的那些传记作品再行审视和批评，就会产生相反的效果。对错误进行纠正，这样的提纲对于历史写作的革新，可以说几乎不会有什么贡献。取而代之的做法是，在此，我希望详细复述一下，我在撰写卡尔·波普尔的传记，阅读他的自传，并重新复原和再现他的知识发展情境时，我所遇到的诸多困难。在此，我还希望重申一下传记在思想史中的重要性：它在解释思想的流变、理解新思想逐步为人所接受的方面，都是不可或缺的。对个人生平情境逻辑的追求，是每一本优秀传记的标志，同时又能使历史学家们对个体所涉猎的思想范围和创造性的限度及其可能性进行评价。如果不能做到这般精密、细致，那么，在思想史的研究中，语境上的生搬硬套，形成错误的叙事逻辑，对传统传记写作进行批评时所指向的那种历史叙事中广泛存在的越界现象等危险就会潜滋暗长。但同时，我也希望阐明传统传记不会就此沉沦下去的原因所在，同时进一步表明，即便是最优秀的传记也会存在的部分局限性。自开始撰写青年卡尔·波普尔的传记以来，我已经更多地转移到叙事史的主题领域上来。当然，我认为，这样的领域转变，是存在着一定的代价的。就像制度和话语一样，传记可以为我们表明，个人思想之养成会融入总体结构，而个人在互动方面仍会独善其身，保有着自己的地位和个性。在叙事史上，总体结构的形成和影响，历来都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解释模型的复杂性在不断地上升，精确度却在逐步地下降。受制于把历史叙事作为多种传记的综合产品而毋

① 哈耶克(1899—1992)奥地利裔英国经济学家。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译者注

庸考虑个体之中可能存在的那些微妙之处的传记作者，将会发现，他们从本文的阅读中收效甚微。而这些，也是传记的局限性所在。

## 新旧传记：对人生的塑造

传记作者们通常会继承一种传统上的写作习惯，对传主们的生平进行记述，所依据的常是传主们的讣闻、自传，偶尔也会参阅前人所作的传记。但他们很少照单全收，依样画葫芦。因此，对于波普尔的生平叙事就特别需要进行一次彻底的修改。似乎是历史的不断干预，在歪曲他的传记，使得他的面目模糊不清。波普尔（1902—1994），一生颠沛流离，即便在1937年移居国外之前，对其故乡来说他都还是籍籍无名之辈；可在最近的20年里，他已经成为奥地利这个国家哲学家中的翘楚。他的百年诞辰大会亦在维也纳隆重举行。尽管他出生并且长眠于维也纳，可他依然主要作为一名西方知识分子和冷战时期自由主义的先知而闻名于世。波普尔在与维也纳学派进行交流的过程中，发展了他的哲学。但波普尔坚决抵制他们的语言学转向。为了反对他们语言改革的平台，他充满敌意地与革命性认知论对立起来，而这一认知论使得哲学、甚至是形而上学复兴，使得仍是未知领域的探究“真理”的方法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任务。维也纳学派认为波普尔的工作对他们的科学哲学大有裨益，这种态度使得《研究的逻辑》有了面世的可能。这本书也被列入该学派的科学世界观系列丛书之中。波普尔在战后初期的绝大多数论述都要借助维也纳学派流亡者的二次转述。波普尔不断发出他是学派的批评者而非其盟友的抗议之声，可这种声音一直颇显微弱。被他称为“实证主义传奇人物”的那些学者开始呈现在世人面前。

在将维也纳的进步遗产推进到战后时代问题上，波普尔是最重要的哲学家。对维也纳学派和红色维也纳进行批判时，他遭遇了维也纳启蒙运动后期的哲学和政治问题，以及科学理性和中欧民主的两次战争危机。为了重塑世纪末的进步遗产，他一边畅想着致力于追求真理与改革的乌托邦式的科学和政治共同体，一边刻绘出了自由主义科学和政治的新愿景。他所做的关键性争辩，对政治和科学理性进行了检验。创建一个自由的公共领域是建立开放社会的必要条件，所以他对一个熟悉的自由主义主题进行了革新，这一主题曾被伊曼纽

尔·康德（Immanuel Kant）<sup>①</sup>、斯泰尔夫人（Germaine de Staël）<sup>②</sup>、弗朗西斯·基佐（François Guizot）<sup>③</sup>、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sup>④</sup>和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sup>⑤</sup>不同的思想家们所共同关注。

我所著的思想传记把波普尔复原到世纪末的维也纳和两次世界大战中的中欧，以及一个与被同化的犹太知识分子一起消逝的世界。我历史性地再现了波普尔，以期重新发现后冷战世界所恢复的激进的及社会主义的维也纳遗产。然而，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自从20世纪80年代开启这项工作以来，我所面临的主要困难一直是如何重构波普尔的思想传记。起初，我以为他是战后自由主义者行列中的一员，但很快我便发觉：作为一名历史学家的我，在冷战的背景下阅读《开放社会》（1945）和《历史决定论的贫困》（1944—1945）这两本基础性著作时，它们对我而言毫无意义。这两本书所探讨的问题和人物从根本上来说属于不同的社会背景，而且流行的冷战思维也大大超过了文本抵制所能达到的范围。如若想要理解波普尔政治哲学的起源，就必须回溯到两次世界大战中的维也纳。可是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年轻一代的奥地利学者，通常是左翼分子，并且是徘徊于奥地利各大学边缘位置的一类学者，也仅仅是在最近20年里，才开始接触到那些精彩的著作，而正是这些著作，让我们重新找回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维也纳文化。波普尔的档案至今仍未可得，而且他写于1974年的《自传》，远不如我所期望的那般有用，因为其中有些问题已经过时，有些则又缺乏历史细节。我曾经对波普尔进行了一场长达4小时的访谈，他非常热情友好，但是对世界大战那段岁月的记忆已经有些黯淡，而且似乎也不愿再提及它们。我拜读了他1928年的博士论文，以及他1925—1931年期间在奥地利学派改革运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这些文章让我清醒地认识到，《自传》根本就没有精确地描述其思想的演进，而是旁涉了一些我所不熟悉的问题和背景，所以，我又陷入了之前的茫然不知所措之中。别无他法，我只得遵循

---

① 伊曼努尔·康德（1724年4月22日—1804年2月12日），出生于普鲁士的柯尼斯堡（现俄罗斯加里宁格勒），著名德国哲学家，德国古典哲学创始人。他被认为是现代西方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也是启蒙运动最后一位主要哲学家。——译者注

② 斯泰尔夫人（1766—1817），法国女作家，活跃于法国大革命与拿破仑统治时期。——译者注

③ 弗朗西斯·基佐（1787—1874），法国历史学家、政治家。——译者注

④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1806年5月20日—1873年5月8日），或译约翰·斯图尔特·密尔，也译作约翰·斯图尔特·穆勒，英国著名哲学家和经济学家，19世纪影响力很大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他支持边沁的功利主义。——译者注

⑤ 尤尔根·哈贝马斯（1929—），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批判学派的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旗手。——译者注